

尊事实 辨联系 抓矛盾 求创新

——学习吴征镒院士运用唯物辩证法
指导科学研究

杨永平 杨 雅

杨永平（1965~），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杨 雅（198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程师。

吴征镒院士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也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

1946年2月，时年30岁的吴征镒先生经云南大学生物系助教殷汝棠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云南大学东陆大楼的标本室内宣誓入党，“彻底地从科学救国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由书生变成了真正的战士，彻底跟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吴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却比这还要早。据吴先生在“吴征镒自定年谱”中回忆，1940年他参加了由王天眷、胡光世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在昆明大普吉的“妙高寺”旁和“丁信塘”畔，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以及《论持久战》和《论联合政府》等进步文章。

吴先生常感叹“转益多师是我师”，其中以吴韞珍、李继侗和闻一多对其影响尤甚。吴先生曾回忆：闻一多先生把他领进以“坐而论政，各抒己见”为宗旨的“十一学会”，较早结识潘光旦、吴晗等进步知识分子，后经闻一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吴先生曾称赞闻一多先生“美国学成回国后，思想转变到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考察社会、人生、历史和文学，逐渐成为一个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文学的大家”。由此推测：1946年的吴征镒当已谙熟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还可能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

吴征镒先生从不掩饰他对唯物辩证法之偏爱。他一生勤奋刻苦、著作等身，却常以“敝帚自珍”自谦，唯独对他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却津津乐道。在《我与植物学研究》一文中，吴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开始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热带种植业中的矛盾和问题，并逐渐认识到植物与土壤、小气候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植物地理方法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的结果，使我发展了对许多对立统一范畴的具体认识，如连续分布与间断分布。”在《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自序一文中，他指出：“……总的努力是想以东方人的宏观、整体观、直观、辩证观，以综合和归纳为主的科学思维，弥补西方人的微观、孤立观、绝对观、推理和分析为主的科学思维的不足之处。”另有一例，当吴先生读到徐仁院士“哪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能按照辩证观点去认识问题，就会走入迷途。”“科学工作者应该经常从自己熟悉的微观世界里跳出来，看看植物学在宏观世界里的的发展，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才能保证科研工作顺利发展。”他深情感叹“旨哉斯言，我当作为座右铭，时时体会才行”，得此言，犹如获至宝之快！

吴先生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方面颇具心得，成绩斐然。这里我们鹦鹉学舌地效仿吴先生的新“三字经”，以“尊事实、辨联系、抓矛盾、求创新”归纳吴征镒院士活学活用唯物辩证法四个方面的





内容，与各位分享我们的粗浅学习体会。

第一，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因时因需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坚持科研为国为民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自然界、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是客观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特性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人们改造自然、变革社会的活动要以承认自然、社会的客观性为前提，并在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不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吴先生认为：为学要坚持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观点，不可持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要有怀疑精神和知不知精神，“尊事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即客观世界）出发。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世界水平、中国水平）来决定研究的内容。中国是生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复杂的国家，因此生物学研究就要根据国情，体现中国特色。

正如吴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许多科技工作者都经历了一个“科研为谁服务”自我反思和调整的过程，经历了从“没有和中国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只是从个人出发、追寻兴趣，缺乏一定的远大目标”到“为人民服务”做科研的过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橡胶宜林地考察、紫胶资源的寻找、群落站建设，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调查以及后来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甚至他“跃退”到过区系关去编写植物志等，吴先生总能根据国家的需求适时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一条十分清晰的“以任务带科研”的历史脉络。在自然保护方面，他在大规模毁林种粮种树、“改天换地”的热潮中，敏锐地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并完善具体建议，提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研究并举，建立混农林复合体系等近自然、高产出人工系统的初步设想，以及提出作为植物园保护工作重要补充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新建议，等等。这些都源于吴先生对世情、国情、民情、社情的深刻认识，国家需求的战略思考，以及服务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担当。吴先生坚守“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是为人类服务，同时也为真理服务”的信条，牢记“科学院是服务行业”“为人民大众索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为形成生产力、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

第二，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运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观点和方法研究复杂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关系以及时空动态变化，提出野外和室内相配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合作的现代植物学发展方向。

吴先生不止一次地坦言：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与大规模考察中，理论联系实际，逐渐形成生态系统的初步轮廓，以及作为第一性的植物与土壤、气候等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并致力于理解和阐述各要素相互关系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的建设工作。客观世界中存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观点是指导先生在科研中不断创新，“终有所得”的制胜法宝、“敲门砖”或“金钥匙”。吴先生曾回忆：他从联系普遍性这一辩证观点认识到生物的系统发育深受地球发生、发展的制约，地球演化的规律由深受天体演化规律的制约；认识到生物系统从一开始就形成绿色植物、动物和广义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吴先生提出：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宏观向全球构造和历史研究发展，微观向着细胞、染色体和基因结构研究发展，其中有各种研究层次相互承接和交叉。……要坚持多学科、多兵种、多方面协同作战，把生物多样性的宏观研究和物种的中观研究与遗传育种等微观研究三方面紧密联系起来，选择一些关键地区密切结合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做深入的

研究，在研究创新和对社会经济战两个方面都有所贡献。

第三，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地理学，创立三维节律演化和生物类群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新理论，提出在我国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协调微观改造和宏观工程相结合的新思路。

吴先生通过运用对立统一这一辩证观点，在理解和阐述植物地理学，特别是巧妙利用绝对与相对、现实与可能、必然与偶然等具体范畴方面分析各类地理成分方面有了新发展、取得新成绩，如连续分布与间断分布，新特有与古特有等，进而发展了系统发育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和区系发生和发展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初步创立了有关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世界科属区系的发生和发展、中国植物区系的特征及演化等方面的东方人的认识系统。

认识到遗传与环境是生物进化的矛盾，进化的动力是地球上已有各类群自身运动，矛盾的解决而不断爆发式上升的，吴先生据此创立了三维节律演化和生物类群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理论，也是他运用辩证法分析生物进化的“一己之得”吧。

在科学分析中，吴先生很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如分析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者关系，他指出绿色高等植物具有主导地位。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协调中，核心是协调人与绿色高等植物的相互关系。人类必须合理利用这第一性生产者，保护其不断增殖能力和种质资源，充分尊重和发挥绿色高等植物在一切生态系统中起协调作用，才是抓到主要矛盾，才有可能实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和“天人合一”之境界。

第四，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观点，学习他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坚定信念和强大自信，学习他不迷信权威、不迷信自己、“尤爱真理”的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

吴先生曾直言不讳地告诫我们：科学院应是一大群永远不懈的求真者，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不可迷信权威、迷信专家、迷信自己，真正做到“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一点虚假。科研就是去伪存真、去伪求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尽管认识方法有差异，认识程度有不同，但务求理论结合实际得到对相对真理的统一认识。吴先生曾坦言：我搞了60年的植物分类，认识到一条真理，就是分类学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中前进，因此可以常进常新；分类学也罢，其他科研活动也罢，其实都有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偏至正中的过程。这或可以算是吴先生对我等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创新、坚持创新的鼓励和寄语。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当前中科院上下正凝神聚力，为实现“四个率先”奋斗的进程中，重温吴征镒院士的为学之道，具有其现实意义。

说到唯物辩证法，我（指杨永平）应该是从中学时代的政治课开始入门和学习，但那种不得要领的死记硬背实在乏善可陈。到昆明后，偶尔听到吴先生谈他运用唯物辩证法为学处事，于是很早就有要把吴先生此番心得做一系统梳理的冲动，也正好把我那没有学好的政治课补补课，因此，完成此拙文以了心愿算是必然，但和学习图书情报管理的杨雅同事合作，却是偶然！算是我们文理科合作的成果吧！

